

目录 Mulu



毛泽东自传

毛泽东

1——70

毛泽东在本文中自述从童年到 1936 年的种种经历和思想的发展过程。

十岁时家中有十五亩地,不久又添了七亩,每年可以收入八十四担谷子。

从小爱争斗,在家里与母亲结成统一战线,与父亲辩斗。

十三岁时辍学种田,给雇工当助手。看了一本《盛世危言》的书,激发复学的念头,同时对劳动产生了厌倦。

在长沙读书时从广告上招到三个半朋友,一个是罗章龙……还有半个是李立三。

长沙师范毕业后去了北京。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很想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交谈,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里,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回长沙后开始投身于政治运动,在湖南成功组织一次起义;在井冈山争取当过土匪的王佐、袁文才参加红军;建立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曾被俘,用几十块大洋贿赂押送的人,不准后又逃跑,差点被抓住……

1973 年周恩来的膀胱癌再次复发。

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

周恩来挨批期间,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平时热情打招呼的人此时见了总理却表现冷淡,尽力回避。

周恩来正在输血,王洪文指令总理立即去开会。其实这次政治局会议并无重要的议程非周恩来出席不可。

周恩来病情恶化,张春桥不同意他住院,并要修改病历,保健医生斗胆顶撞。

周恩来手术前在卫生间写最后的嘱托,并亲手交给邓颖超一个牛皮纸大信封。

“我”在蔡锷手下当过连长、营长,又升为团长、旅长。参加过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在四川大败清总督赵尔丰,战胜袁世凯部队。打败唐继尧之后升为云南省警察厅厅长。

与唐继尧第二次交火失败后逃往四川,受督军刘湘的厚待并被物色为师长人选。“我”谢绝后去上海寻找共产党。

在柏林遇到周恩来,时年“我”三十六岁。在德国两次被捕,为革命坐牢总共只有 58 小时。

在南昌公安局长的任上举行南昌起义。1928 年到井冈山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

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个妻子是师范教员,第二个妻子是起义军人,最后一个是康克清。



周恩来的 最后1323天

张佐良

71 — 132



与尼姆·韦尔斯 谈个人经历

朱德

133 — 148

目录 Mulu



我 在北京 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149 — 164

初办学时,北京大学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其时风气,做学问的教授不受欢迎,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却很受欢迎。

“我”任校长后,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第二要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入手。

聘请了陈独秀、胡适之、鲁迅等一大批有才华有思想的教员,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其时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学生思想活跃,富于创造性。建立最早的科研机构。

辞退了几个外国教员。有一被辞英国教员竟要求英驻华公使来谈判、威胁。

招收三名女生入学,开中国高校男女生同校之先河。

因主张思想自由,北大成为众矢之的。

“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自传,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描写出来,作为现代青年一种活的经验。

写自传的人,照例是从幼年时代说起。我自幼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县考时,我将字典上的难字和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想到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

江南乡试中看到种种怪现状,因此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乡试的结果却对我有意外收益。



实庵自传

陈独秀

165 — 186



目 录

MULU



我所认识的 瞿秋白同志

丁玲

187 — 225

瞿秋白的第一个爱人叫王剑虹,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王剑虹和丁玲嘲笑时常去她们寓所玩的柯庆施为“烂板凳”,却对初次见到的瞿秋白很好感,认为他很出色。

上海大学最受欢迎的教师是瞿秋白。他讲哲学,但对文学也很精通。

施存统说瞿秋白承认他自己确实堕入恋爱里边去了。丁玲逗他说,是不是爱上你老婆了。

秋白工作很忙,却很能安排时间,他每天写诗,全是送给王剑虹的情诗。王剑虹也天天写诗送他。

丁玲离开上海一个多月后回来,却“人去楼空”,王剑虹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

瞿秋白是不愿当领袖的,连诸葛亮都不想做,但在革命最困难的严重关头,他毅然走上党的最高的领导岗位。

要不是肺病,秋白就会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而不是留在白区被捕被杀,那么历史就会是另一种结局。

毛泽东

自传



毛泽东



童年时代

我 1893 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的名字是毛顺生,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是文七妹。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十五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有二十五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七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我十岁时家中有十五亩地,一家五口人,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加的七亩地后,我的祖父去世了,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起来了。

毛泽东自传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子的买卖,从而赚了一些钱。他成为“富”农之后,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且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动。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并没有开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粮食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冬天碾米的时候,他便加雇一个短工在地里劳动。所以这个时候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了。我们家吃得很节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1918年秋,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来到北京。先是住在北大哲学系教授杨昌济家中,不久搬入景山东街的一间普通民房里,同屋有北大学生蔡和森、罗章龙等8人。1919年底至1920年初,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图为1920年1月28日,毛泽东与辅社同仁在北京陶然亭合影。左三:王复生,左四:毛泽东,左六:罗章龙,左七:邓中夏。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十三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时曾经逃离学校。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什么地方的山谷里。我流浪了三天,最后还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在兜圈子,走了那么久,离我家大概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况会有点改善。我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啊。

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

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指毛泽民)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这个上了年纪的人继续“积聚财富”,在这个小村子里被认为是发了大财。他自己不再买进土地,但却典进了很多别人的田地。他的资产增加到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毛在他的解说里幽默地使用这些政治名词,一边追述这些事情,一边大笑。——斯诺注)。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



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越来越恨他，我们建立了一条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他。同时，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工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在湖南组织成立新民学会。它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宣传社会主义。图为1919年5月，毛泽东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部分会员在长沙合影。中排右起第六人为毛泽东。



作上非常勤快,记账也仔细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上过两年学,认识的字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却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学者”。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



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怀疑神、佛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感到忧虑,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不表示意见;后来,有一天,他出门去收一些款子,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突然遇见人,立刻逃跑了。然而对此更加感到惊异的却是我父亲。事后他对自己这个奇迹般的脱险思考得很多。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从

此，他对佛教比较尊重了，间或也烧些香。然而，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他只是在自己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祷告一番。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我跑到一个失业的学法律的人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又跟一位老先生读了更多的经史之类的书，而且还读了许多当代的文章和几本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商民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发生的一个大暴动的情况。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





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在这以后,抚台衙门一个姓庄的特派大员骑了马出来,告诉人们说政府将采取步骤帮助他们。姓庄的这个许愿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帝不喜欢他,并且谴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这里说的 1910 年的长沙抢米风潮的具体情节和事实有些出入。饥民群众攻打巡抚衙门时,湖南巡抚岑春煊为群众的势力吓倒,把巡抚的职务交给了湖南布政使庄赓良。庄在未上台时表示同情群众,所以曾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他在当上了代理巡抚后立即反过脸来,严厉地镇压群众。群众风潮继续发展,清朝政府下令把岑、庄二人都撤职,另调官员担任湖南巡抚。)

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韶山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

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山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裕的农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量粮食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没收了。他怒不可遏。我并不同情他，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错误的。

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对我有影响的事，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过激派”教师。说他“过激”，是因为他反对佛教，而且要消除鬼神。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被人广泛议论的人物。我钦佩他，并且赞成他的意见。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



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之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县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里去当学徒。起先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到那里去上学。这个学校设在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告诉我有关这个新式学校的情况和“新法教育”带来的变化。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的“新学”却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相当“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校去注了册。我说我是湘乡人，

1919年，毛泽东出任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图为青年毛泽东及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薪金底册。

